周恩來的初戀

齊 夫

周恩來的初戀女友叫張若名，與鄧穎超同爲天津南開學校第十級學員，比鄧穎超大兩歲。她家境好，出身富商，人也特別聰明漂亮，心高氣盛，學習成績一直都是第一。周恩來與張若名都是人中翹楚，一個風度翩翩，才華橫溢，一個貌美如花，又一起參加革命，大家都說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一九二〇年初，在一次抵制日貨活動中，周恩來擔任總指揮，和郭隆眞、張若名、于方舟帶領數千名民衆到直隸省公署請願。四人當場被捕，張若名與周恩來一同坐了半年牢。出獄後，因擔心當局還會再次加害，四人決定一起赴法勤工儉學。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周恩來一行乘法國輪船波爾多號離上海赴法。這一年周恩來二十二歲，張若名十八歲。海上航行的一個月裡，他們朝夕相處，耳鬢廝磨，一起學習討論，一起憧憬未來，戀情發展很快，也曾山盟海誓，也曾心心相印，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剛到法國時，張若名在巴黎的雲母片廠一面做工，一面學習，周恩來則在巴黎郊區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一九二二年春，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共產黨旅法小組，一九二二年，張若名也加入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產黨」。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戰友，又是兩相歡洽的情侶，物質生活雖然艱苦，但他們精神卻是愉悅的。每到休息日，兩個年輕人就去逛香榭麗大街，去參觀羅浮宮，去塞納河上划船，去瞻仰名勝古跡。

後來，兩人的關係逐漸出現了一些微妙變化。矛盾主要表現在，張若名因爲組織活動，受到了法國秘密警察的追查詢問，險些被當局驅逐出境，還因出身問題在黨內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慢慢開始厭煩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活，想不管「閒事」，好好留學。而周恩來依然信仰堅定，初衷不改，立志要爲中國革命奮鬥終生。兩個人一再發生爭吵，誰也不能說服誰，久而久之，裂痕越來越大，最後只有「道不同不相爲謀」，兩人揮淚告別，分道揚鑣。

很多年後，周恩來在談到這一段往事時，很坦然地說：「張若名因爲出身問題，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參加政治活動，遭到法國警察幾次跟蹤盤問。她感到委屈和不滿，決定退出黨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我是認定馬克思主義不變的，我的終生伴侶，必須是志同道合，經得起艱難險阻的戰友。於是我主動與張若名說清楚，開始與鄧穎超通信，還向她求婚。」

最後的結局，兩人雖無情緣，卻求仁得仁，各遂其願，周恩來成了偉大的革命家，新中國的締造者；張若名則以優異成績取得了文科博士學位。當時與她先後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女學生約有四十餘人，而能夠獲取博士學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爲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回國後在雲南大學執教。遺憾的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上午，系裡開反右批判會，要她承認諸多罪名。張若名倍感羞辱，性情剛烈的她選擇了投水自盡。消息傳到北京，周恩來震怒，在他和鄧穎超的直接過問下，張若名才得到平反昭雪。一代才女香銷玉殞，令人唏噓不已。

印尼小費

李 敏

早就聽說印尼離了小費寸步難行，沒想到我在印尼的幾天還眞見識了一下。

那天，我從酒店去雅加達火車站，上了一輛出租車，那司機一動不動地看着我，要知道我手上拿着兩個大包，還有一個旅行箱，要在國內，司機早就下車幫忙了，更何況我還是個女子呢！我瞪了司機一眼，只好自己動手將行李放進了汽車後備箱。車到火車站後，我將五萬盾（一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千二百盾）的紙幣交給司機，司機立刻下車幫我搬起了行李，我心裡很奇怪，這哥們爲何突然變得殷勤起來了。可是結果我立刻就知道了，我準備向他要找的零錢時，那司機奇怪地看着我，竟然冒出一句中文：小費。後來聽朋友說，印尼的出租車是不找零的，如果你沒有零錢支付，那你多出的錢就是小費了，而且即使你有零錢，每次也要多付上千盾小費，如果你只按記價器的數目付費，司機是不給你開車門的，更別提爲你提行李了，直到等你給了他小費。

在印尼東部的班達群島旅遊時，恰逢雨天，濛濛細雨卻也增加了一種浪漫意境，在景點的入口處，有許多十來歲的小孩，他們手上拿着很大的一把傘，我正奇怪這些小孩在這兒幹什麼時，其中一個長得很清秀的小女孩立即迎着我上來了，將一把雨傘高高地舉到我的頭頂。我吃了一驚，但很快發現，每一個遊客都受到了這等禮遇，我只好愉快地接受。小女孩陪同我逛了整個景區，臨結束時，我給了她二萬盾。小女孩接過錢後，又投入到她的「工作」中去了。

印尼的小費無處不在，就連在商場購物也要付給收銀小姐小費。那天，我在雅加達的一家商場購買一些紀念品，到收銀台用VISA卡交款，那個收銀小姐幾次都告訴我刷卡不成功，而我分明看見她並沒有將卡接觸到機子上，我突然明白了，立即從口袋裡拿出一張二千盾的紙幣給她，這次卡一下就刷成功了。

在印尼我還差點「賺」了一次小費。那是回國的前一天晚上，我去雅加達蘇迪爾曼街的朋友家做客，吃完晚飯，朋友送我出來，我正準備攔出租車，朋友告訴我別攔出租車，這會兒這裡實行交通「三合一」的管制，即每輛車必須乘坐三人以上才可通過該街，只要攔下乘客不夠數的車子，不光能坐免費車，還有可能掙到小費。朋友在路邊豎起食指，果然沒兩分鐘，一輛豪華的轎車停在了我們的身邊，上面除了司機只有一名乘客，我上了車。司機問我去哪裡，我告訴他酒店的名字後，他說正好順路，於是將我送到了酒店，我下車時他竟然抽出一張一萬盾的紙幣給我，我推了回去，並告訴他：我們各取所需，謝謝。

這裡的變化靜悄悄

言止善

江蘇省屬我國沿海發達之地。提到江蘇，人們會自然地想到古今都繁華的南京，以及蘇州、無錫、揚州，還有那富甲天下敢爲人先的華西村。至於南通，一般人不大熟悉，知道的也會認爲那不過是長三角的一個邊緣城市。的確，南通過去有些落後，在本世紀初，它的GDP增長速度等方面在江蘇省十三個地級市中居末位。

近年來，這裡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到了二〇〇五年，在工業經濟、民營經濟、外向型經濟、GDP增長速度之類主要經濟指標方面，南通已經躍居江蘇省第一。此後三年，南通一直保持此地位。二〇〇九年，在長三角地區的十六個城市裡，南通是GDP增速最高的。

南通人不但抓物質文明，而且抓精神文明。北京奧運會上，南通選手拿了四金一銀一銅。二〇〇八年，江蘇省高考前十名裡，有八名來自南通。多年來，南通人口爲負增長，男女性別比爲一〇四比一百，這在全國也屬罕見的突出。

十五年前，朱鎔基視察時曾提出過批評，「你們要把南通從垃圾堆中解放出來。」今天，你若去南通，卻可以感受到「城在水中座，人在畫中遊」。溫家寶看到後稱讚南通是「人傑地靈，民風淳樸，文明程度高」。

進入南通的高速公路和國道兩旁，你能看到這座城市的許多名片：全國文明城市、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市、全國雙擁模範城、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秀地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家環境保護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園林城市……

南通的進步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旗指引下南通人民通力合作的結果，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九年前擔任南通市長，七年前擔任市委書記的羅一民。羅「文革」後畢業於南京大學，之後在南大任教，八十年代末進入政界，按仕途的一般規律，幾年前他可望進入省的領導層，可是，事情並沒有「順理成章」地發生，因此有研究者稱之爲「羅一民現象」。羅一民本人對此卻很淡然，他表示，「就我個人的認識而言，陞遷，不過是我們這些仕途中人的一種常規想法，跟人生價值的實現，沒有什麼必然關係。」「我將南通看做自己的作品，我不能留下敗筆，我在這裡默默地苦幹，既是成南通之美，也是成我之美。從價值實現來看，我也是爲自己做事。正如幾年前，一位不知名的老者給我寫信：今天你成就了南通，將來南通一定會成就你。」

這位獻身南通的知識分子，在當選市長的人代會上曾一諾千金：「大家已經完成了法律形式的選舉，但是，內心深處的選舉還沒有完成。我的最大願望就是，將來，我卸去市長職位時，在座的各位，能夠慶幸地說：當初，我們沒有投錯票，選錯人。我相信，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南通一定會傲然崛起在蘇中大地，巍然屹立在揚子江畔，黃海之濱。」如今，他已兌現了自己的諾言，南通人民也把他們內心珍貴的一票投給了他。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無疑，羅一民是一位務實的理想主義者，近年來，華夏大地的變化正有賴於一大批如此對家國以身相許的赤子。他們是辛勞的，也是幸福的。有位學者分析得好：「幸福最重要的就是對未來有美好的希望，一方面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好，另一方面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好。」

我與書：記憶中的零零碎碎

吳 彬

北京《讀書》雜誌執行主編吳彬近影

非常肯定的是，我與書本子結下了今生今世的不解之緣。自記事以來，我想不起自己有哪一天是沒有看過書的。實在地說，看書這件事對於我，似乎已經不好單單看作是出於求知、好學或者用功——給自己的讀書行爲加上這些動機，總覺問心有愧，因爲怎麼想也覺得那恐怕就是一種癖好，是上癮、是與吃飯睡覺一樣的生存需求。從小到大，我入睡前一定要先看一會兒書，吃飯時飯碗旁也要攤着書，上洗手間要帶着書——現在有舒適的「洗手間」設備，自然不成問題，就是當年蹲在公共廁所、用破木板圍着的簡易茅房裡也不例外，起碼也要揣上一張報紙，年齡更小沒有看報紙的資格時，是先在手裡拿着、繼而嘴裡叼着「小人兒書」完成如廁程序的。總之，只要不做其他事，我的眼睛就一定得對着一本書，所以迄今爲止好像沒有過瞪着眼空愣神兒的時候，也沒有失眠的時候，躺在床上只要還睜得開眼，眼前準有書，放下書時肯定就是睜不開眼了——雖然作爲一個讀書人，居然都沒有過失眠的經歷，自己也覺得挺不好意思的。

據說我小時候非常「煩人」，只要逮到一個大人就要纏着人家給我「講書」，而且要沒完沒了地反覆講。其實我記憶力不錯，不管什麼書，只要聽一遍後，就可以幾乎一字不錯地複述內容。可不知是什麼毛病，就是非要聽別人「講」不可。有了這個毛病，自然是唬得家裡所有的大人見了我都望風而逃。自願給我「講書」的，只有我的外公。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把連環畫放在膝蓋上，用一隻手吃力地翻開書頁給我「講」的樣子。其實外公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經中風偏癱，喪失了說話的機能。看着嘴裡發出「嗚嗚呀呀」聲音的外公，雖然年紀很小，我卻也懂得迎着他滿臉的焦急連連點頭，反正書裡的故事早就滾瓜爛熟，就是喜歡有人在給我「講」——眞是怪毛病。

大概是因爲家裡識字的人都躲開了我，所以我早早地被逼上了「自己看」的「梁山」。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看了第一本眞正的「書」，那是從家中書櫃裡偷出來的《西遊記》，因爲實在心癢癢地想知道，孫猴子對付衆多妖怪，施展的都是些什麼神通。書裡不認識的字當然多得不得了，還有許多詩詞歌賦等等「累贅」，好在把這些都閃過去，上竄下跳、隔三差五地看下來，倒也不耽誤把師徒四衆和妖精們的故事都看明白了。從此一發不可收，那個時候見得到的大大小小的書，從兒童讀物到大部頭的中國外國文學作品，只要弄得到手，都被我當成「棗兒」囫圇吞了。

那個年代也很奇特，現在做家長的，如果看到自家孩子讀書，高興都來不及。可在我少年時，家長除了課本以外並不讚賞自己的孩子看「課外書」，說是會使「思想複雜」。這在那個時代也是個嚇死人的負面詞，跟「思想骯髒」以至「思想反動」就算不是同義詞，差別也不過是幾步之遙。我家父母也不例外，他們防我看書就跟防賊一樣，不但書櫃上鎖，放書櫃的房間也上鎖。可書櫃裡那些總在我眼前晃的古裡古怪的書名——什麼《水滸傳》、《紅樓夢》、《阿里斯托芬戲劇集》、《華倫斯坦》、《普希金文集》、《威克菲牧師傳》、《貴族之家》、《磨刀石農莊》、《日日夜夜》，更不用說還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千零一夜》、《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話》、《瘸腿魔鬼》……沒法拿到手，實在急得人抓耳撓腮。

也是迫於無奈，爲了取得這些讓人眼饞的書，只好做涉險犯禁的勾當了。我想出的辦法確實也是「做賊」的行徑，接近現在說的「溜門撬鎖」。當然撬鎖的本領是絕對沒有的，但那時沒有現在這種三防、四防的門鎖，鎖門就是在一個帶合葉的扣袢上加把鎖。鎖雖然打不開，但扣在扣袢上的合葉是可以動腦筋的。合葉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固定在門框上的部分，另一個是可以轉動的部分，兩部分的連接是靠中間穿着的一根「軸」，就是這根「軸」成全了我。我用一根小釘子對準「軸」，再用錘子砸幾下，那活動的軸就脫落下去，兩個部分就此分離，於是房門洞開，任我長驅直入——至於書櫃的鑰匙，不管我媽媽藏到哪裡，絕對逃不過我的搜尋。

拿走書時當然也要在書櫃裡做做手腳，有包封的，書拿走，封套原樣立在書櫃裡，沒包封的，把書放鬆動些，看不出少了一本就行。出房後，把合葉上的軸再用錘子敲回去，原封不動、不留痕跡不說，還可以反覆作案，不愁被發現。自那以後，整個櫃子裡的書，凡是中國文字的全被我讀遍了。奇怪的是，以我小學生的文化程度，居然沒有感覺到讀豎排繁體字的障礙，甚至也根本不知道還有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區分——不都一樣看嘛！現在想想，那時認識的簡體字本也有限，繁體字頂多也就是同樣不認識，但靠了書本裡故事情節的牽引連接，我居然閃展騰挪地暗渡陳倉，不知不覺通過了這道關口。

可是最後母親還是發覺我動了她的書，她拿着一本《紅樓夢》審問我，是不是拿去看了，我當然矢口否認，媽媽一聲不響地翻開一頁用手一指，我頓時目瞪口呆——無法抵賴了，那頁書上有幾個清楚的髒手印……

我雖然堪稱酷愛讀書，但稱不上愛惜書，被我看過的書經常是破破爛爛的。一是因爲喜歡三遍五遍以至十遍八遍地看，書本耗損嚴重；二是吃飯看書，書上菜湯油漬不免，三是睡覺時看書，又要避人耳目，書經常被壓在枕下、塞在被中，以至破壞了品相；至於剛在院子裡、胡同裡與同學夥伴們瘋跑後回來，趁父母沒下班，抓起書就看，更是家常便飯，滿手的灰土自是要留在書裡。憑這個證據破案，一抓一個準。

母親爲了確保我品行「端正」、思想「單純」——這是那個時代優秀兒童的必備條件，認爲在寒暑假期間，應盡量不讓我單獨在家，所以上班時把我帶到她的單位親自管理，監督我完成我最厭煩、經常不能按時完成的假期作業和她規定的其他功課，譬如寫日記、寫大楷小楷等等。正在百般無奈、無計可施之際，不想天無絕人之路，又一處新大陸竟被我發現了。母親以爲機關的資料室裡都是業務資料，沒有我會感興趣的東西，所以放心地把我放在那裡做作業，哪知我在書架間亂竄了一陣後，看到一大架子《文史資料》。開初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翻了幾本，越看越有趣，於是隨媽媽上班的日子也不枯燥難熬了。

那個暑假，從這些東一本西一本的「資料」裡，我知道了藏傳佛教的好多故事，知道了班禪、達賴的傳承規則，知道了轉世靈童的金瓶掣籤是怎麼實施的，知道了幾代達賴爲什麼沒有活到成年；也知道了極斯菲爾路七十六號裡的陰森可怖，有個叫吳四寶的傢伙在那裡任意殺人；知道了李士群是吃一盤肉丸子裡的青菜被毒死的，至於他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被毒死，卻是沒有搞得清楚；還知道了有一位關在集中營裡叫張露萍的女子被特務殺害了，她是被騙說要釋放，在路上中彈的，當時她身穿自己剛領回的薄呢咖啡色連衣裙，戴着紅寶石戒指，死後的表情是「滿臉怒氣」。這個形象留在我腦子裡好多年揮之不去。

只要有心，找書看的機緣還是隨處都有的。當年我家住在北京內城邊上，背靠城牆，前臨護城河，一個三合院裡住着四家人。三家都是「幹部」，只有一家是工人，這家的主人是個扳道工，據說在這個院子分配給各家以前，他就跳牆進來，自行作主打開了一間耳房，自己搬進來後又從農村接來母親和妻子兒女。可能是有關管理部門要讓他們搬出佔用的房間，我記得他家的老奶奶曾站在院子中的大槐樹下拄着拐杖聲明，誰讓他們搬出去就死給誰看——那老奶奶是裹過腳的，一雙小腳肯定小於三寸。他們最終沒有搬出去，他家的女兒後來也成了我的同學。這位敢作敢爲的大叔有把小提琴，有時會聽到他拉當時的流行歌曲，他還經常從勞動人民文化宮借書，書上都蓋有公章。我以與同學做作業、溫習功課爲名，躲在他家的小板櫈上看他借來的那些書。《高爾基短篇小說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蝕》、《霜葉紅似二月花》以及若干長篇小說如《黑鳳》、《晉陽秋》、《楓橡樹》、《前驅》等等都是這麼看的。

還有個看書的地方是外婆家。我是在外婆家長大的，隨父母居住後，周末或放假還是經常去，舅舅那許多書櫃裡比我家多得多的藏書，一直讓我眼巴巴地心癢難撓。由於我一直認爲長輩們都是不鼓勵小孩子亂讀書的，所以覺得最好的辦法是別驚動他們，自己悄悄拿來讀再悄悄放回去，神不知鬼不覺最保險。我在這裡讀過丁玲、郁達夫、浩然等人的小說集，讀過《隋唐演義》、《三遂平妖傳》、《說岳》，還有《三家巷》、《小城春秋》、《紅旗譜》等等；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時，直覺到那文字和情節背後有更爲厚重的東西超出了我所能理解領會的範圍，可就是情節和故事也足夠吸引我了；對《浮士德》當然是莫名所以，但對書裡漂亮的插圖很是喜歡；看《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和歐・亨利的小說以及《莫里哀喜劇集》，是特別開心的經歷，經常邊看邊笑；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和蘇聯小說《青年近衛軍》則讓我捧着書本泣不可抑。

（四之一）

南湯圓 北元宵

霍無非

「元宵爭看採蓮船，寶馬香車拾墜鈿，風雨夜深人散盡，孤燈獨喚賣湯元」。自古以來，湯圓（元宵）就是新春佳節的喜慶食品之一，象徵家家團團圓圓，美滿幸福，尤其是正月十五元宵節，湯圓（元宵）更是必不可少。儘管外形一樣滾圓潔白，但南北叫法不同，南方人稱湯圓，北方人謂元宵，做法亦有區別。湯圓的製作體現了南方人的細膩精緻，是靠手工一個個包出來的，把芝麻餡、花生餡等加入適量糖、油調好，將糯米粉（北方稱爲江米）和得稍軟，揪下來擀成皮，放入餡，捏緊，在掌心輕輕揉搓成丸。不一會，一個滾圓的湯圓就包好了，掌心的溫暖，附在了湯圓上。

元宵則不同。它的餡由紅綠絲（果脯切絲）、核桃仁、桂花、花生、沙糖、豬板油等食料調製，再用手或擀麵杖壓平，稍乾凝結後切丁，用笊籬在冷水裡一抄，撈起餡丁甩乾水，放進盛着江米粉的笸籮裡，兩手奉着笸籮左右篩動，一堆濕潤的餡丁在笸籮裡滾來滾去，沾上乾粉，裹住餡丁。滾到不黏時，笊起用冷水再抄一下，放入笸籮繼續篩，反覆幾次，元宵像滾雪球似逐漸滾大，直到成形，融入北國冰雪風情，符合北方人豪爽大氣的性格。

白皮甜心，是湯圓和元宵的相同點。但湯圓是包出來的，心靈手巧，逐個製作，口感糯軟，元宵是「滾」出來的，屬「批量生產」，稍硬一點，有咬頭。同一種應節食品，反映了南北不同的飲食習慣。

京郊畫家村

梅桑榆

宋莊小鎮，位於北京東郊，距通州城十餘華里，因小鎮聚集着許多畫家，故名「畫家村」。我住通州多年，竟未去過宋莊，直到二〇〇八年十月，聽說宋莊在舉辦藝術節，方與妻前往一遊。

一條寬闊的馬路，直貫小鎮南北，路邊有許多畫廊與美術用品商店，連飯店茶室的招牌，名稱與樣式，也頗具藝術色彩。馬路有幾個十字路口，每個路口，都立着造型別致的柱子，上有許多標誌牌，牌上標名各種名稱的畫廊、藝術空間、藝術館、美術館、展覽中心、美術中心的走向。向東西沿伸的道路，有的較窄，沿窄路而行，兩邊多是平房，有的房門或牆上貼着招租的廣告。據說，宋莊鎮中心小堡村，及周圍幾個村落中，有一千五百多名畫家與雕塑家、攝影家。成功的畫家，有的買下農家院，有的建起了工作室，而許多揣着理想，初來畫家村的青年，或是缺乏知名度，畫技一般，作品久不得售的人，只有租一間平房暫棲身了。初闖北京的艱辛，我曾親嘗，那些爲實現自己的夢想初來此地創業的年輕人，或雖未有多大收穫，但仍堅守精神家園，堅持理想追求的人，其生活狀況可以想像。

畫家村雖名爲「村」，卻有八座美術館或藝術中心，是中國藝術展館最爲集中之地。其中上上國際美術館，佔地六十餘畝，展廳面積二萬餘平方米，爲藝術家與民營企業家投資建成。這座美術館是城堡式建築，外牆爲灰色磚砌，大門爲一長方形鋼鐵巨框，從牆壁半腰突出，巨框漆成鐵鏽色，下有鋼鐵階梯通往大門，造型頗爲獨特。此館正舉辦國際藝術年展，我遂購票入內參觀。館內有很多展廳，展品有國內外藝術家各種門類、各種流派的繪畫、雕塑與書法作品，有的作品，竟是以錢幣、鞋子、鐵鍋、掃帚等種種實物擺出，似乎是以其表達某種觀念。

這種藝術，與現代派藝術、當代藝術一樣，讓我費解，但有個展廳內的雕塑，卻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且使我對繪畫雕塑藝術的功用，有了新的認識。

那是一個長型展廳，進門左側，擺着一張龍椅，上有一層矗着的白色玻璃纖維，龍椅的下面，也撒着一層厚厚的玻纖。長滿絨毛的龍椅，寓意好懂，即顯示其古老陳舊，已塵封發霉也。展廳內陳列着一排雕塑，排在第一位的作品，極有視覺衝擊力，令我暗自驚嘆：一個人，雙手反綁，身上腳下，有許多小人物。雕像下方，一群人正揮着鐵鎬、大錘，在刨、在砸；雕像身上，一些人正在向上攀爬，許多人已爬到雕像的肩上，一些人各拿鐵鏟、鐵錘、大鋸、大鎬，他們或張口吶喊，或面帶勝利的笑容，或對雕像指面怒斥。再細看這些小人物，多爲工農裝束，也有戴着眼鏡的知識分子。而雕像的面容，則呈痛苦絕望，張口慘叫狀。雕像整體爲泥紅色，下方有一卡片，標明作品的題目爲《被縛的奴隸》。我走到展廳的盡頭，轉身抬頭望去，見展廳上方扯着幾道鋼絲，鋼絲上倒懸着許多人體雕塑，這些人體，分爲紅、黃、藍、白、黑五色，從頭到腳被鐵絲緊緊捆綁，臂腿並攏，有的兩臂做掙扎狀。長了毛的龍椅、被縛的巨人，以及那些倒懸的人體，結合起來看，具有強烈的批判性。以前，我一直認爲繪畫與雕塑，只能表現藝術性，而很難表現出思想性，看過這些雕塑，我才發現自己的片面與無知。

出了上上國際美術館，我又與妻在鎮上轉悠，參觀了根雕奇石展覽，又去看畫家大院。在前往宋莊美術館途中，路邊有長達數百米的廣告牆，上面畫滿大幅廣告。難怪藝術家稱這裡是「藝術集市」、「當代藝術的江湖」了。我初進小鎮時，見高聳的門樓上大書「中國宋莊」四字，後來發現，這四個字在鎮上反覆出現。一個小鎮，不註明所在市縣，直接冠以「中國」二字，可見其已聞名中外。